

影響臺灣民衆重分配政策偏好的因素*

陳文學

國立臺北大學
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博士候選人

羅清俊

國立臺北大學
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教授

本文藉由2010年「公民意識與社會正義」調查資料，以多變量統計模型分析臺灣民衆的個人客觀特質、主觀認知以及所處政治經濟環境（所居住的縣市）對於重分配政策偏好的影響。統計分析結果發現：第一，教育程度越高、家庭每月總所得越低、越具有平等價值觀、認同泛綠政黨、認為貧富差距嚴重、公民意識越高等特質的民衆，都越偏好重分配政策。第二，相較於公平正義的觀點，理性自利的觀點比較適合用來解釋臺灣女性偏好重分配政策的理由。第三，民衆的公民意識越強而且認同泛綠政黨時，將會更偏好重分配政策。第四，相較於個人層次的影響因素，本文並沒有發現民衆所處政治經濟環境差異對於重分配政策偏好的影響。這些研究發現對於瞭解臺灣民衆的政策偏好以及反省政府相關政策都具有重要啓示與意義。

關鍵字：公民意識、重分配政策、政策偏好、政黨認同、貧富差距

* 作者衷心地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所提供的寶貴審查意見，惟文責由作者自負。本文所使用的量化資料來自於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的政治思想研究專題中心與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共同進行的「公民意識與社會正義」調查資料，作者謝謝兩個中心慨允提供調查資料。本文初稿發表於中央研究院政治思想研究專題中心與政大選舉研究中心合辦的「公民意識與社會正義學術研討會」（2011年6月17-18日），作者感謝研討會評論人蔡佳泓教授的精闢評論，同時也要向當天與會給予指教的先進們致謝。

壹、前言

民眾對於公共事務的認知與偏好是民主政府所不能忽略的重點，因為這是政府制訂相關政策的正當性與否的關鍵之一。然而，在專家主義的影響之下，有時候政府可能不自覺地忽略民眾的感受與偏好，以為政府只要透過各種政策解決公共問題，並使政策成效展現於國內、外的客觀評比或社經指標，就可以獲得民眾的支持與肯定。其實政府瞭解民眾的政策感受與偏好的重要性絕對不亞於追求客觀績效的提昇，尤其是攸關民眾生活福祉的重分配政策議題。

在國外，民眾對於重分配政策偏好的研究已經累積相當多的研究成果，不過國內在這方面的研究仍然不多（Chang, 2010；何智翔、林翠芳，2011），或者是散見於政治發展、政策偏好或是地方政府財政支出的研究題材之中（Hsieh, 2005；黃德福、謝俊義、劉嘉薇，2010；蔡佳泓、俞振華，2011）。¹ 基於此，我們藉由 2010 年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的政治思想研究專題中心與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共同進行的「公民意識與社會正義」調查資料，重新檢視影響臺灣民眾重分配政策偏好的因素。² 本文除了關心民眾的個人客觀特質（如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家庭總所得等等）與主觀認知（例如社會地位、政黨認同、平等價值觀、貧富差距認知與公民意識等等）對於重分配政策偏好的影響之外，更探究民眾所居住的縣市是否因為政治與

1 Hsieh (2005: 19-20) 透過 2001 年臺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資料 (TEDS 2001)，探討族群與國家認同兩項因素對於臺灣政治發展的影響，他發現越不支持政府推動社會福利的民眾，通常也越不會支持泛綠陣營。黃德福、謝俊義、劉嘉薇 (2010: 118, 147) 探討民眾對於各類政策的偏好發現，社會福利政策是民眾相當重視的政策之一，而女性與中高白領特質的民眾尤其重視社會福利政策。蔡佳泓、俞振華 (2011: 101-102) 則發現各縣市民眾的社會福利預算偏好並沒有顯著影響縣市政府社會福利支出的人均決算。

2 「公民意識與社會正義」調查係由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於 2010 年 11 月 5 日至 11 月 8 日針對全國民眾（不含金門與馬祖）所做的電話調查，有效樣本為 1,073 份，在 95% 的信賴水準下，抽樣誤差為 $\pm 2.99\%$ 。樣本藉由反覆加權法，加權性別、年齡、教育程度與居住地區等母群體比例後，樣本與母群體在性別、年齡、教育程度與居住區域上並無顯著差異。

經濟環境的不同（縣市家庭可支配所得、縣市家庭貧富差距、縣市失業率、縣市長黨籍與民進黨執政深度），而不同程度地影響他們的重分配政策偏好。而這一點，也是過去國內研究較少觸及的地方。

本研究除了有助於累積國內重分配政策偏好的研究成果之外，對於瞭解目前臺灣民眾的政策偏好以及反省政府相關政策等等，也都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在本文的結構安排方面，以下我們先回顧過去國內、外有關重分配政策偏好的研究，作為本文分析架構的理論基礎。第二，提出本文的研究設計，包括「重分配政策偏好」分析模型以及各個變數的資料來源與操作化內容。第三，進行實證分析，包括各變數的敘述統計分析與多變量迴歸分析。最後則是摘要研究發現並加以討論。

貳、文獻回顧

一、重分配政策的概念

理論上，重分配政策（redistributive policy）係指政府對社會上某一群體課稅，並將這些稅收轉移而讓另一群體獲利（Denhardt and Denhardt, 2009: 57）。政府這些轉移的政策到底包含了那些具體的範圍呢？根據 Meier（2000: 81-83）的看法，重分配政策主要包含五項政策領域：第一，所得穩定（income stabilization），例如美國的社會安全局（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藉由補貼所得的方式，保障 65 歲以上的民眾能擁有最低收入。第二，福利（welfare），例如美國食品營養局（Food and Nutrition Service）的食物券以及營養午餐計畫。第三，健康照顧（health care），就如美國醫療保險財政管理局（Health Care Finance Administration）針對老人與窮人所設計的健保計畫。第四，住宅（housing），例如美國住宅與都市發展部（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提供窮人購屋的優惠房貸。第五，所得分配（income distribution），例如美國國稅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透過不同稅制（tax code）的設定，來增加國家進行所得重分配的稅收。

而除了以上這些將富有者的資源移轉至貧窮者或者是能力不足者的政策方案之外，Ripley 與 Franklin（1991: 21）更認為重分配政策還包含了權利

(rights) 移轉的政策，目的同樣在促進民眾基本權利的保障。這類的具體政策就如美國對於黑人的公平就業機會保障可能會讓白人在求職或陞遷的時候，從原本的贏家而成爲輸家。由此觀之，重分配政策的概念隱含著以政府爲主體所推動的所得重分配、就業、退休、社會福利、健康醫療以及人權保障等等物質性與價值性的政策，目的是讓貧窮者或者沒有足夠能力的人在基本生活條件上能與富有者的差距減少，並且維持這些人的基本生存權利。

二、影響重分配政策偏好的因素

對政府來說，探詢民眾的重分配政策偏好及其影響因素，除了可以增進政府推動重分配政策的正當性之外，更可以針對不同特質民眾的需求，給予不同方式或者是不同程度的政策協助。

以往有許多研究都指出民眾有高度的重分配政策偏好，但是由於研究者的研究取向不同，使得探索民眾爲何偏好重分配政策的觀點也不盡相同。歸納來看，這些觀點大致包含理性自利與經濟環境、公平正義與政治環境、貧富差距認知與政治資訊、社會階層、國家認同以及宗教信仰等等幾種不同觀點（Bartels, 2008; Chang, 2010; Corneo, 2000; Corneo and Grüner, 2002; Hasenfeld and Refferty, 1989; Johnston, Banting, Kymlicka, and Soroka, 2010; Lübker, 2007; Rehm, 2005; Scheve and Stasavage, 2006）。以下本文即回顧這些觀點的內容與研究成果，做爲本文進行實證分析的理論基礎。

(一) 理性自利與經濟環境

民眾基於理性自利，認爲重分配政策能增加他們的淨所得，所以會偏好重分配政策。Meltzer 與 Richard（1981）的研究是早期提出這種觀點的重要作品。Meltzer 與 Richard（1981）認爲在多數決的選舉制度下，所得爲中位數左右的選民（median voters）會是影響選舉的關鍵選民。如果中位數選民的所得低於全體選民所得的平均值，則中位數選民就會投票給提倡所得高度重分配或是提倡高稅率的候選人。因爲藉由這些高度重分配的政策，能使中位數選民享受到福利並且增加淨所得。相反地，如果中位數選民的所得高於全體選民平均值時，那麼他們就會投票給支持低程度所得重分配或是低稅率

政策的候選人。換言之，選民會基於自己所得的高低，而影響自己對於重分配政策的偏好。

有關所得與重分配政策偏好的關聯性假設獲得後續相當多實證研究的支持。例如 Corneo (2000) 研究美國與東、西德民眾（居住在統一之前東德與西德境內的民眾）支持政府重分配政策的因素，他發現不論是美國、東德或者是西德的民眾，都認為因為重分配政策可以增加他們個人的淨所得（「經濟人效果」(homo oeconomicus effect)），³ 所以他們偏好重分配政策。並且，Corneo 與 Grüner (2002) 基於 Corneo (2000) 的研究架構，重新分析 12 個不同國家，也再次印證了理性自利的假定。

除此之外，Hasenfeld 與 Refferty (1989) 利用美國底特律地區的調查資料，發現多數的民眾都相當支持政府推動的重分配政策。其中，社會安全或失業給付類型的政策支持度更高於失依兒童家庭補助金 (Aid to Families with Dependent Children, AFDC) 或食物券的政策，因為前者不僅對窮人有利，同樣也可以保障上流或中產階級的財產權，至於後者則只對貧窮線以下的民眾有幫助，所以它的支持度就比較低一些。此外，他們也發現那些可以享受重分配政策利益的人，確實也比較偏好重分配政策，例如家庭所得偏低、非白人、女性、年輕人、教育程度較低。⁴

同樣的，Rehm (2005) 運用 2002 與 2003 年歐洲社會調查資料，探討 17 個歐洲國家的民眾支持重分配政策的影響因素，他發現各國民眾支持重分配政策的比例都相當高 (69.8% 的民眾支持政府進行所得重分配)。當民眾的特質為女性、低家庭所得、低教育程度、非自雇者、正處於失業、工會成員、

3 Corneo (2000) 的民眾淨所得操作化的方式是採用 1992 年國際社會調查 (International Social Survey of Programme, ISSP) 資料中，有關民眾在重分配政策實施後的淨所得增減預期的問項。問卷的問項為：「假如在所得變得更平均後，某些人的所得會增加，某些人則會減少，請問您認為您的所得會如何呢？」答項為：必定增加、可能增加、維持現況、可能減少、必然減少。

4 Hasenfeld 與 Refferty (1989) 的研究也發現：支持政府積極促進社會公平和主張社會權利 (即國家應保障民眾基本生活) 的自由派意識型態的民眾，也會偏好政府的重分配政策，並且高度主張社會權利的人，更是直接影響民眾重分配政策偏好的因素。有關個人秉持公平正義價值而影響重分配政策偏好的相關討論，詳見本節後段。

個人所得低於全國平均值、獲得政府移轉性支出越高、所任職的產業失業率高、個人的技術過於專精與個人職業的失業風險越高時，都會傾向支持政府的重分配政策。這個結果一方面顯示經濟弱勢者因為可以享受重分配政策的利益，所以會表達支持之外，同時也呈現出重分配政策具備社會保險的意涵，亦即，民眾會擔憂未來失業的可能性與維持最低限度收入的需求。是故，即使民眾現在無法受到重分配政策的照顧，但是當他們預期未來可能會享受到時，他們就會認為重分配政策有存在的必要性。而這一種個人基於失業保險而偏好重分配政策的看法，同時也呼應了 Iverson 與 Soskice (2001) 分析 1996 與 1997 年 ISSP 的發現：工作技術越專精，轉換跑道也越不容易，所以會更加支持政府推動社會福利政策，以保障他們在失業時能有基本的所得收入。

在國內的研究方面，何智翔、林翠芳 (2011) 更發現不同特質的民眾對於不同類型的重分配政策偏好也不同，例如未婚、未加入工會、個人越擔心老年生活等特質的民眾，會更偏好政府增加醫療保健的支出；未婚、教育年數較低、不傾向泛藍以及個人越擔心老年生活等特質的民眾，會更偏好政府增加老人年金的支出；男性、教育年數低、失業、擔心老年生活、擔心失業以及非自雇者等特質的民眾，會傾向支持政府增加失業保險的支出；男性、年齡越大、教育年數越高、失業與貧富差距認知越大的民眾，會認為目前高所得的人租稅負擔過低。這些研究發現顯示理性自利的考量似乎也是影響臺灣民眾偏好重分配政策的重要因素。

然而，儘管有許多研究支持理性自利的假設，但是仍有一些研究的發現並非如此，例如 Dion 與 Birchfield (2010) 運用 1984 年至 2004 年 50 個國家以上的跨國調查資料，結合個體因素（個人）與總體因素（國家或區域特質），重新檢視各國民眾是否會一致性地因為經濟自利的緣故，而傾向於窮人支持（或富人反對）所得重分配政策。他們認為影響民眾政策偏好的因素其實是相當複雜的，尤其是各國經濟發展與文化歷史皆不相同。因此，他們懷疑各國未必會一致性地呈現經濟自利的偏好影響因素。他們透過統計分析發現，當個人特質為女性、失業者、年齡越大與所得較低時，都會偏好重分配政策。由於這些人口的特質多為經濟弱勢，表面上似乎證實了民眾經濟自利的考量影響了民眾的重分配政策偏好。但是，當他們以多層次模型（Multi-level

Analysis) 進一步分析樣本所屬的國家特質時，雖然發現已開發國家的民眾的所得越高，的確會越反對重分配政策；不過，低度開發國家的民眾的所得變數對於重分配政策偏好幾乎沒有任何影響。此外，以區域來看，同樣是貧富差距都很大的國家，北美國家的民眾高度支持經濟自利的假設，但是中東與拉丁美洲國家卻非如此。簡單地說，當民眾所處的經濟環境不同，影響民眾偏好重分配政策的因素也不盡相同，即便是獲得多數研究所支持的經濟自利假設，同樣也不是放諸四海皆準的影響因素。而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在分析民眾的重分配政策偏好時，也必須留意他們所處經濟環境差異所產生的影響。

(二) 公平正義與政治環境

就公平正義觀點而言，民眾會偏好重分配政策源自於個人的利他行為以及對於顧及社會整體和諧的渴望。也就是說，不論個人貧富與否，民眾認為政府應該讓社會上每個人都有基本的發展機會與物質條件。Bartels (2008: 127-143) 的研究支持了這個論點。Bartels 發現有將近八成五的美國民眾認為社會應持續地確保每個人都能擁有平等的機會。而當民眾具有越高的平等價值 (egalitarian values) 時，他們也會更傾向於支持社會福利相關政策 (例如就業政策或黑人救助政策等等)。這顯示民眾的平等價值不只是個人的內在信念而已，它更會直接影響個人對於重分配政策的偏好程度。⁵

除此之外，Suhrcke (2001) 透過 1999 年 ISSP 針對 23 個國家的調查資料庫發現，中東歐後社會主義國家的民眾比西方市場經濟國家的民眾，更具備平等的價值觀，也更無法容忍貧富差距擴大的現象。這蘊含著後社會主義國家的民眾可能會比較支持政府朝向福利國家的改革方向。這一種政治系絡差異可能導致民眾有不同重分配政策偏好的看法，也獲得 Rainer 與 Siedler (2008) 的研究證實。Rainer 與 Siedler (2008) 發現東德的民眾比西德的民眾更偏好重分配政策，顯示出過去社會主義意識型態仍相當程度地影響現今

5 值得一提的是，Bartels 也發現如果民眾認同民主黨與自由派意識型態時，同樣也會更支持社會福利政策。

東德民眾的價值觀。換句話說，在不同政治意識型態的政權長期執政下，即便經過輪替或轉型，民眾的價值觀或者對於某些政策議題的看法並不會因此而輕易改變。所以當我們觀察民眾的重分配政策偏好影響因素時，也不能忽略民眾所處政治環境的差異可能會塑造民眾不同程度的重分配政策偏好。

(三) 貧富差距認知與政治資訊

貧富差距認知的觀點認為，民眾會偏好重分配政策主要是因為他們認為社會上的貧富差距頗大，需要政府推動重分配政策來減少貧富差距。例如 Lübker (2007) 利用 1999 年 ISSP 分析 26 個國家民眾的重分配政策偏好後發現，當民眾認為貧富差距擴大時，他們會更傾向於支持政府推動重分配政策。相同地，在國內，何智翔、林翠芳 (2011) 藉由 2006 與 2007 年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的資料庫分析民眾的重分配政策偏好。他們也發現當民眾認為貧富差距變化擴大時，將會更傾向認為高所得者的租稅負擔過低或者是低所得者的租稅負擔過重。因此，個人貧富差距認知是影響重分配政策偏好的重要因素。

只是，民眾的貧富差距認知是怎麼形成的呢？Bartels (2008: 153-155) 發現除了民眾的家庭所得與政治意識型態兩項影響因素之外，當民眾的政治資訊掌握程度越豐富時，通常也會認為社會上的貧富差距逐漸擴大而且是一件壞事。⁶ 並且，政治資訊獲得越豐沛的自由派民眾比政治資訊獲得越豐沛的保守派民眾，對於貧富差距的認知差異更大。延伸這種看法，既然政治資訊掌握程度影響他們對於貧富差距的認知，而貧富差距的認知影響他們對於重分配政策的偏好，所以民眾的政治資訊掌握度可能也會影響他們的重分配政策偏好。並且當民眾的擁有更豐富的政治資訊同時又偏好自由派的政黨時，可能會更加偏好重分配政策。

6 在 2002 年的調查資料中，政治資訊的問項為：「對於政治與公共事務資訊的掌握程度？」，答項為非常低至非常高，共 5 等分；在 2004 年時，政治資訊則是藉由詢問 7 題有關參、眾議院多數黨與重要政治人物的職位的問題，依據受訪者答對與否，聚合出受訪者所擁有的政治資訊數值 (Bartels, 2008: 153)。

(四) 社會階層、國家認同與宗教信仰的觀點

在社會階層方面，Corneo 與 Grüner (2002) 發現，如果個人認為所得是天註定的而與努力無關，他也會更偏好重分配政策。其次，個人如果會因為重分配政策而讓自己的社會階層向下流動時，將會更反對重分配政策；相對的，對自己來說，那些所得比自己高一階層的人如果因為重分配政策而多付出資源，並因而降為與自己相同社會階層時，則這種情形對自己階層的社會形象和生活品質都會有加分的效果，所以也會更偏好重分配政策。除此之外，Rainer 與 Siedler (2008) 經由 2005 年的德國社會經濟調查資料庫發現：個人預期未來薪資將會增加的人，將會反對「貧者課稅過高、富者課稅過低」。相反的，假使個人預期未來職位將會降級 (demotion)，則會更贊成「貧者課稅過高、富者課稅過低」。這顯示，個人預期薪資與職位的變動將會連帶地影響個人的社會階層變動，因而塑造了個人對於重分配政策的偏好。

在國家認同方面，Johnston 等人 (2010) 提出國家認同對於重分配政策的影響。他們基於自由民族主義 (liberal nationalism) 的論點認為：國家認同是社會的黏著劑 (social glue)，當民眾的國家認同越強烈時，除了可以減緩高所得者抗拒福利政策，也可以祛除族群文化差異所造成的隔閡，促進社會團結 (social solidarity)。因此，假如民眾的國家認同程度越高時，可能也會更支持健康醫療、退休金與所得重分配等等福利國家思維的政策。經過統計分析後，證明了這個假設，尤其是民眾的國家認同感越高時，越會高度支持政府推動健康醫療政策。⁷

在宗教信仰方面，Chang (2010) 運用 2006 年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資料，分析民眾不同宗教信仰與偏好重分配政策之間的關聯性。他發現年齡、所得、教育程度與政黨認同等等都是影響重分配政策偏好的因素。更重要的是，信仰基督教的民眾會比較偏好就業與醫療照顧方面的重分配政策；信仰

7 Johnston 等人 (2010) 也發現個人基於經濟自利而偏好重分配政策。亦即，若回答者的特質為女性、所得越低、工會成員、即將面臨失業與家庭經濟狀況不佳等特質時，也會更加支持所得重分配政策。而年齡為 65 歲以上的人雖反對所得重分配政策，但卻相當支持退休金政策。

佛教的民眾偏好醫療照顧方面的重分配政策；信仰道教的民眾則偏好物價穩定與醫療照顧方面的重分配政策；民間信仰者傾向認為政府應補助低收入家庭的大學生；而信仰天主教的民眾偏好重分配政策的狀況並不明顯。有趣的是，Chang 更發現參與宗教活動次數越多的人，反而越不偏好重分配政策。這一點除了和 Scheve 與 Stasavage (2006) 研究 11 個國家的民眾宗教參與和社會福利支出偏好的發現相同（民眾宗教參與越高，會越不支持政府的社會福利支出）之外，也與 Bartels (2008: 130-135) 的發現（經常到教堂做禮拜的人則較缺乏平等價值）頗為類似。⁸

三、小結

綜合以上各種觀點的實證研究，本文將影響民眾偏好重分配政策的因素歸納為個人的客觀特質、主觀認知以及個人所處的政治經濟環境的差異（居住在不同縣市）等等三類因素。第一，個人的客觀特質，包含個人的性別、年齡、教育程度、職業別、家庭所得與族群別都會不同程度地影響他們對於重分配政策的偏好，例如女性、老人、低教育程度、低所得、具少數族群身分者 (minority) 可能會因為經濟較為弱勢而偏好重分配政策。第二，個人的主觀認知，即個人認知貧富差距的大小、主觀評價自己的社會地位、平等價值觀、偏好的政治意識型態、政治資訊的掌握度，以及國家認同與宗教信仰（參與）等等因素，也會左右自己對於政府推動重分配政策的看法。第三，個人身處的政治經濟環境因素，也就是當個人所居住地區（縣市）的客觀經濟表現（如失業率）較差或者是貧富差距較大，以及執政黨是傾向左派或社會主義的政黨或是曾經長期在左派或社會主義政黨執政下，民眾通常也會更加偏好重分配政策。

相較於以往的國內研究 (Chang, 2010; 何智翔、林翠芳, 2011)，本文觀察民眾所處的政經環境對於民眾重分配政策偏好的影響是比較特別的地方。

8 有關宗教信仰與重分配政策的關係方面，Scheve 與 Stasavage (2008) 研究美國 1970-2000 年各州社會福利支出與宗教信仰之間的關係，他們發現如果該州民眾宗教參與程度越高以及宗教信仰人口比例越高時，則該州的就業津貼、就業補助與失業保險的支出會比較少。

臺灣各縣市政經環境有相當的差距，在政治環境方面，國民黨傳統上多被歸類為傾向右派的政黨，而民進黨則被歸類為傾向左派的政黨（林佳龍，2000: 30；詹火生，2011: 83）。並且在競選階段的宣傳或者是實際執政，民進黨也都比國民黨更傾向推動重分配政策。在競選方面，民進黨於1992年的立委選舉時就提出建立福利國的主張（林萬億，2005: 14）；在1995年立委選舉當中，社會公平與重分配的議題更成為民進黨的選戰主軸（林佳龍，2000: 29）。而在執政時的社會福利政策推動上，不論是社會福利觀、預算支出、創新方案，或者是首長的重視程度等等，臺北市民進黨主政時期皆優於國民黨主政時期（陳正芬、官有垣，1997）。⁹ 在這種情況之下，居住（或長期居住）於民進黨執政縣市的民眾在重分配政策的偏好上，可能因此會高於那些居住（或長期居住）於國民黨執政縣市的民眾。而在經濟環境方面，由於各縣市的經濟發展與貧富差距並不一致。如果民眾居住於經濟發展較差或是貧富差距較大的縣市時，他們的重分配政策偏好可能也會高於那些經濟發展較佳或是貧富差距較小的縣市民眾。

最後，本研究也必須說明的是，由於「公民意識與社會正義」調查資料的限制，使得本研究無法分析族群別、國家認同和宗教信仰等三個變數對於民眾重分配政策偏好的影響。首先，在族群別方面，國外研究發現少數族群比較偏好重分配政策（Alesina and Giuliano, 2009; Bartels, 2008）。這對於國內來說，相對於漢人，原住民或許也會更偏好重分配政策，可惜的是「公民意識與社會正義」調查的原住民樣本並不多，因此我們難以有效地觀察原住民

9 蔡佳泓、俞振華（2011: 101-102）分析我國地方政府支出與民意之間的關聯性，他們發現民進黨執政的縣市在社會福利的人均決算上並沒有顯著偏高。不過，嚴格說起來，縣市政府社會福利支出的資料其實並不能百分之百看出縣市首長「個人」在社會福利政策上面的企圖心。因為依照我國現行「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的規定，中央可以就實際狀況補助縣市基本財政收支差短及基本建設經費，這項補助就稱之為一般性補助款。一般性補助款是由行政院主計處依公式核算補助給縣市政府，具體的補助範圍涵蓋各縣市基本財政收支差短之補助；教育設施、社會福利、基本設施之經費補助；各縣市退休公教人員優惠存款差額利息繳款補助等等。也就是說，縣市政府社會福利支出當中有一部份是中央要求地方來做的政策，但是卻是一併編列在縣市政府歲出預算當中。歲出預算有這種特質，當然決算也不例外。

的重分配政策偏好是否會高於漢人。其次，在國家認同方面，國外所研究的國家認同是對單一國家的認同程度，他們認為民眾的國家認同強度越高，則社會凝聚感也會越高，也會比較支持重分配政策（Johnston et al., 2010）。雖然「公民意識與社會正義」調查資料中有國家認同的問項，不過它是在確認受訪者究竟是認同那個國家（例如認為自己是臺灣人、中國人、或者兩者都是），而不是在單一國家已經確認無誤的情況下（例如我們是臺灣國），受訪者對於這個國家的認同程度。並且，本研究是以個人為分析單位，除非我們能預先設定「臺灣人」、「中國人」、或「都是」這三種情況當中的某一種才是國家認同的基準，否則我們無法估算出每位受訪者的國家認同分歧程度。因此本研究決定不放入國家認同的變數。第三，在宗教信仰方面，因為「公民意識與社會正義」調查資料並未調查民眾的宗教信仰或宗教參與程度，所以本研究並無法探究民眾宗教信仰與重分配政策偏好之間的關係。

參、模型建立與變數操作化

基於前述文獻探討，本研究為探討臺灣民眾偏好重分配政策的影響因素，建立「重分配政策偏好模型」如下：

$$\text{重分配政策偏好}_i = \alpha + \beta_1(\text{個人客觀特質}_i) + \beta_2(\text{個人主觀認知}_i) + \beta_3(\text{政經環境因素}_i) + \varepsilon_i$$

其中，重分配政策偏好 i 為第 i 個民眾對重分配政策的偏好程度；個人客觀特質 i 包括第 i 個民眾的性別、年齡、教育程度、職業別與家庭每月總所得；個人主觀認知 i 包括第 i 個民眾認為自己的社會地位高低、平等價值觀、政黨認同、公民意識以及貧富差距認知；政經環境因素 i 則是第 i 個民眾所居住縣市的家庭可支配所得、縣市家庭貧富差距、縣市失業率、縣市長黨籍與民進黨執政深度； ε_i 為誤差項。

在統計分析的執行策略上，我們利用 Stata 10.0 統計軟體，先分析模型中各個變數的敘述統計。之後，再利用最小平方迴歸分析法（Ordinary Least Squares, OLS）估計各個自變數對於重分配政策偏好的影響。在運用 OLS 的

同時，我們也將檢測迴歸模型的多重共線性（multicollinearity），以及矯正變異數不齊一（heteroscedasticity）的問題。

一、依變數：重分配政策偏好

依變數為民眾的重分配政策偏好，資料取自「公民意識與社會正義」調查中 C13、C15、C26 與 C27 等四題有關民眾認為政府是否應縮小貧富差距、是否發展社會福利、是否多照顧弱勢者以及是否要求有能力者多負擔一些等等問項的加總（KR20=0.3），¹⁰ 分數介於 0 分至 4 分之間，分數越高表示民眾越偏好重分配政策。¹¹ 而在這四題之中，若有受訪者對於任何一題的答項為無反應時，¹² 本文則將其視為遺漏值來處理，本文其他的變數也以同樣方式處理。¹³

10 就這四題而言，認為政府應該縮小貧富差距的民眾，他們通常也會認為政府應該照顧弱勢（ $p < 0.01$ ，卡方值為 12.17）。此外，認為政府應該縮小貧富差距的民眾，他們通常也會認為政府應該發展社會福利（ $p < 0.05$ ，卡方值為 5.59）。另外，認為政府應該縮小貧富差距的民眾，他們通常也會認為政府應該讓有能力的人多負擔一些（ $p < 0.01$ ，卡方值為 16.71）。因此，從這些分析結果看來，受訪民眾對於這些議題的偏好程度呈現高度的一致性。

11 根據過去國內、外重分配政策偏好的研究，民眾的重分配政策偏好的操作化內容可歸為兩類：第一類具體詢問民眾對於政府推動某種特定社會福利或社會保險政策的看法。例如 Chang（2010）運用 2006 年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資料當中，有關民眾對於政府推動社會保險（包括醫療保險、退休保險、失業保險）與社會福利（包括就業、物價、醫療、老人、縮小貧富差距等等）的看法，做為重分配政策偏好的操作化指標。又例如 Johnston 等人（2010）在加拿大公平、安全與社群調查中，以民眾對於退休金、醫療支出與縮小貧富差距的看法，做為重分配政策偏好的操作化指標。第二類主要以民眾對於政府應縮小貧富差距或照顧經濟弱勢的看法做為操作化指標。例如 Lübker（2007）利用 1999 年國際社會調查中，有關民眾對於政府應減少貧富差距的單一問項做為重分配政策偏好的指標。而本研究採用「公民意識與社會正義」調查資料庫中的四個問項（C13、C15、C26、C27）來代表重分配政策偏好的概念，這四個問項的內涵包含民眾期待政府縮小貧富差距、民眾偏好政府推動社會福利、民眾認為政府應給予弱勢者更多的照顧等等，頗符合過去國內、外研究當中對於民眾偏好重分配政策偏好的操作化方式。當然，如果後續的相關調查可以指陳更為具體的社會福利政策，如就業給付或醫療保險等等政策，也許可以更完整的呈現民眾對於重分配政策偏好。

12 無反應：包括看情形、無意見、不知道與拒答。

13 統計方法上，遺漏值可以透過平均數填補或多重插補（multiple imputation）等方法進行填補，但遺漏值相對於其他變數必須符合隨機分布的前提，而本研究所採用的變數經過檢驗後並未符合這一點。因此，本研究在進行統計分析時，一律採用完全排除遺漏值的方法。

二、自變數：個人客觀特質、個人主觀認知與政經環境因素

在自變數方面，個人客觀特質與個人主觀認知的資料皆來自「公民意識與社會正義」調查資料庫。個人客觀特質包括：女性（女性編碼為 1；男性編碼為 0）、年齡（20 至 29 歲編碼為 1；30 至 39 歲為 2；40 至 49 歲為 3；50 至 59 歲為 4；60 歲及以上為 5）、教育程度（小學及以下編碼為 1；國、初中為 2；高中、職為 3；專科為 4；大學及以上為 5）、職業別（分三類，以白領為基準，分別建立農林漁牧與藍領兩組虛擬變數）以及家庭每月總收入（24,000 元以下編碼為 1、24,001 元至 35,000 元為 2、35,001 元至 45,000 元為 3，依此順序，到 130,001 元以上編碼為 10）。

個人主觀認知包括社會地位、政黨認同、平等價值觀、貧富差距認知與公民意識等五項。第一，社會地位取自調查資料 C14 題詢問民眾認為自己的社會地位高低，分數介於 0 至 10 分之間，分數越高表示自己認為社會地位越高。第二，政黨認同來自調查資料 C28 題有關政黨認同的問項。我們將原本答項為國民黨、親民黨與新黨重新編碼為泛藍認同；民進黨與臺灣團結聯盟重新編碼為泛綠認同。然後，以泛藍認同為基準，分別建立泛綠認同與中立選民兩個虛擬變數。第三，平等價值觀取自調查資料 C24 題有關民眾是否同意應該給社會上較弱勢的人更多表達意見的機會。若民眾回答同意時，編碼為 1，不同意則編碼為 0。第四，貧富差距認知來自於調查資料 C12 題詢問民眾對於貧富衝突的看法，分數介於 1 至 4 分之間，分數越高表示自己認為社會上的貧富差距愈嚴重。第五，公民意識方面，由於民眾重分配政策偏好的形成不單單只是來自於個人的經濟狀況、公平價值或是政治意識型態，更可能和個人對於政治資訊掌握度密切關聯。不過很可惜的是，「公民意識與社會正義」的調查資料中，並沒有政治資訊程度的相關問項。然而，該調查資料中的 C8、C9、C10 與 C11 等四題有關公民意識的問項卻也相當程度地涵蓋了民眾對於政治資訊的掌握程度，因為愈具有公民意識的人，通常也會比較瞭解政治事務以及政府的運作。¹⁴ 因而，本文將這四題問項以加法聚合（Cron-

14 Berelson、Lazersfeld 與 McPhee 認為一個具有民主意識的公民，除了對於政治事務有較高

bach α 值=0.576) 並命名為「公民意識」,¹⁵ 以其來代替政治資訊程度。¹⁶ 我們預期當民眾的公民意識越強時, 他們的重分配政策偏好也會越高。

個人所居住縣市的政經環境因素則包括: 縣市家庭可支配所得、縣市家庭貧富差距、縣市失業率、縣市長黨籍與民進黨執政深度等五個變數。這部分的資料取自行政院主計處 2009 年家庭收支調查(行政院主計處, 2010a)、行政院主計處 2010 年 12 月人力資源調查(行政院主計處, 2011a)、中央選舉委員會的選舉資料庫(中央選舉委員會, 2011) 以及維基百科網站中各縣市首長資料(維基百科網站, 2011)。有關五個政經環境變數的操作化內容如下:

第一, 縣市家庭可支配所得為各縣市的家庭平均可支配所得, 例如臺北市為 1,246,310 元、澎湖縣為 689,166 元。當縣市家庭平均可支配所得越低, 表示這個縣市的經濟能力較差。而相對於經濟能力較佳的縣市居民, 經濟能力較差的縣市居民可能會比較偏好重分配政策。

第二, 縣市家庭貧富差距為各縣市家庭可支配所得的標準差, 例如新竹市為 130,293 元、臺中縣為 62,749 元。當各縣市家庭可支配所得的標準差越大, 表示這個縣市的貧富差距越大, 則這個縣市的居民可能會更偏好重分配政策。

第三, 縣市失業率方面, 當各縣市的失業率越高, 表示經濟環境較為不佳, 那麼相對於失業率較低的縣市居民, 失業率較高縣市的居民可能會比較偏好重分配政策。

第四, 縣市長黨籍方面, 民進黨傳統上多被認為是一個較為照顧弱勢族

的興趣外, 也會比較了解政治事務(轉引自 Freedman, Franz, and Goldstein, 2004: 724)。另外, Enslin 也認為具有公民意識的人, 同時也隱含著他可以擷取、了解並且能善用政府的法律、文件、結構與過程等等知識(轉引自 Abowitz and Harnish, 2006: 653)。

15 本文有關公民意識的 4 個問項與郭秋永(2009)評估公民意識的問項相同, 前 2 個問項在測量公開質疑政治權威的意願; 後 2 個則是公開評論政策優劣的意願。

16 以公民意識來替代政治資訊可能有部份侷限之處。由於公民意識除了包含個人掌握政治資訊程度的多寡之外, 通常也包含個人具有公共事務參與意願的高低, 例如公開質疑政治權威的意願, 以及公開評論政策優劣的意願。所以, 公民意識所涵蓋的層面較廣, 這是本研究採用公民意識來代替政治資訊時, 可能會產生的限制。

群的政黨，並且相較於國民黨而言，民進黨的政治意識型態也較為左傾。因此，如果現任縣市長的黨籍是民進黨時，在他們的執政理念影響之下，縣市居民可能會更偏好重分配政策。¹⁷ 當受訪者居住的縣市為民進黨執政時，編碼為 1，其餘編碼為 0。

第五，民進黨執政深度是指民進黨在某縣市某期間內執政年數的比率。有關這個數值的計算方面，首先，在直轄市部份，北、高兩個直轄市長首次民選的時間始於 1994 年，從 1994 年至 2010 年 16 年間，民進黨在臺北市執政了 4 年、在高雄市執政了 12 年，則臺北市民進黨的執政深度即為 0.25、高雄市則是 0.75。其次，在縣市部份，從 1989 年起（第十一屆縣市長），才有候選人以民進黨籍的身分當選縣市長。不過，其實早在 1986 年民進黨成立前，就有部份無黨籍人士當選縣市長，並且他們與後來成立的民進黨也有相當深厚的淵源，例如第九屆縣市長的宜蘭縣陳定南、屏東縣邱連輝、第十屆縣市長的高雄縣余陳月瑛。因此，這個變數在縣市長的部份，本文選擇從 1981 年（第九屆縣市長）起算，假如是無黨籍身份的縣市長則依據是否與民進黨有關，進而判斷是否為民進黨執政。舉例來說，宜蘭縣自 1981 年 12 月至 2010 年 11 月近 29 年期間，民進黨執政 25 年（含無黨籍陳定南），則宜蘭縣民進黨的執政深度為 $25 \div 29 = 0.86$ ；花蓮縣在 29 年期間都是由國民黨執政，即使現任的縣長傅崐萁是無黨籍身分，但是因為他與國民黨淵源較深，所以本文不將他歸為民進黨，則花蓮縣民進黨的執政深度為 $0 \div 29 = 0$ 。我們預期：當民眾長期處於民進黨執政的縣市時，他們可能會更偏好重分配政策。

17 究竟是因為選民需要重分配政策而選出民進黨縣市長？還是因為縣市長是民進黨籍，所以影響民眾對於重分配政策的偏好？其實都有可能。不過因為分析資料上的限制，所以我們只能單方向來驗證民眾是否會受到不同政黨縣市長的影響，而有不同的重分配政策偏好。理想上，如果「公民意識與社會正義」調查能進行長期性的調查，並且增加民眾是否投票給民進黨縣市長候選人的問項的話，那麼我們就能以 t 時間點民眾的重分配政策偏好預測 t+1 時間點他們是否投票給民進黨縣市長候選人（或其他政黨候選人），同時也觀察 t+1 時間點當選的民進黨籍縣市長（或其他黨籍的縣市長）是否會影響 t+2 時間點民眾對於重分配政策的偏好。如此便可以釐清民眾的重分配政策偏好以及縣市長黨籍之間的因果關係。不過，在分析資料的限制下，我們只能依循前述文獻所討論的政治環境脈絡觀點，只檢驗民眾是否會受到不同政黨縣市長的影響，而有不同的重分配政策偏好。

三、交乘變數：「女性×每月家庭總所得」、「女性×平等價值觀」、「公民意識×泛綠認同」

除了上述的基本模型之外，本研究也進一步建立「女性×每月家庭總所得」、「女性×平等價值觀」、「公民意識×泛綠認同」三個交乘變數，分析它們對於民眾重分配政策偏好的影響。

首先，由於過去研究發現女性通常會比男性更偏好重分配政策，而對於這個現象，除了可以被解釋為因為女性多是經濟弱勢者，基於理性自利，所以女性會比較偏好重分配政策（Hasenfeld and Refferty, 1989; Iverson and Soskice, 2001; Rehm, 2005；何智翔、林翠芳，2011）；也可以被解釋為女性比較富有同理心與平等價值觀，所以會比較支持重分配政策（Bartels, 2008）。而本研究為了進一步探究臺灣女性究竟是基於是理性自利或者是公平正義而偏好重分配政策，乃分別建立「女性×每月家庭總所得」與「女性×平等價值觀」兩個交乘變數。假如只有「女性×每月家庭總所得」對於重分配政策偏好呈現負向的顯著性時，我們就能說女性是基於理性自利而偏好重分配政策。相對的，如果只有「女性×平等價值觀」對於重分配政策偏好呈現正向的顯著性時，我們就可以說女性是基於公平正義的追求而偏好重分配政策。而當兩個交乘變數都達到顯著性時（如果前者迴歸係數為負，後者為正），就表示理性自利與公平正義同時是我國女性偏好重分配政策的成因。

其次，基於 Bartels（2008: 153-155）的實證發現：當美國民眾擁有更豐富的政治資訊並且偏好民主黨時，會更認為社會上貧富差距逐漸擴大，而且是一件壞事。而根據之前的文獻回顧，認為貧富差距越大的人也越偏好重分配政策。所以當民眾的政治資訊掌握度越高，可能會越偏好重分配政策，並且當民眾擁有更豐富的政治資訊同時又偏好自由派的政黨時，可能會更加偏好重分配政策。本文進一步將之延伸為：當臺灣民眾的公民意識越強，而且傾向泛綠政黨認同時，將會更偏好重分配政策。因此，我們預期「公民意識×泛綠認同」的交乘變數對於重分配政策偏好呈現正向的影響。依據作者檢閱文獻的結果，目前國內並沒有類似關於公民意識與政黨認同對於重分配政策偏好的影響研究。故而，觀察這個變數的影響也是本文在重分配政策偏好

研究上的另一個額外貢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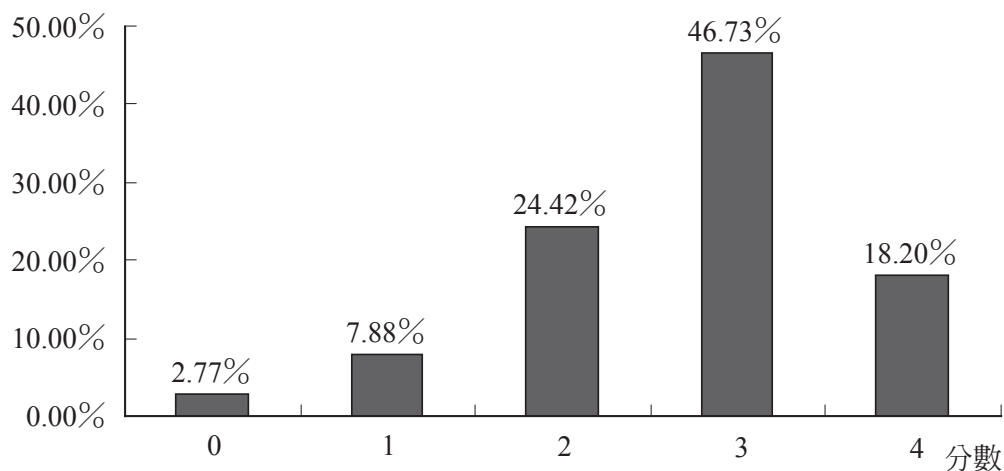
肆、實證分析

一、敘述統計分析

(一) 重分配政策偏好

圖 1 為民眾偏好重分配政策的分數比例，分數越高表示越偏好重分配政策。對於政府應縮小貧富差距、應將有限資源投注於社會福利、應給予弱勢者更多的照顧、應要求有能力的人多負擔一些等 4 題有關民眾偏好重分配政策的問項中，有 18.20% 的民眾 4 題皆表示同意；46.73% 的民眾同意其中的 3 題；24.42% 的民眾同意其中的 2 題，而同意 1 題以下的民眾僅有 10% 左右。這顯示在臺灣有多數的民眾相當偏好政府推動重分配政策。

圖 1：重分配政策偏好的比例



(二) 個人客觀特質、個人主觀認知、政經環境因素

表 1 為各變數的敘述統計分析。有關個人客觀特質方面，樣本的男、女比例大致呈現 50% 與 50%；平均年齡約落在 30-39 歲之間；平均教育程度約為高中、職左右；職業別為農林漁牧者佔樣本數的 7%、屬於藍領者佔 32%，其餘 61% 則為白領階級；平均家庭每月總所得為 5.17 大約落在 54,001 元至

表 1：各變數的敘述統計分析

變數名稱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樣本數
重分配政策偏好	0	4	2.70	.95	900
個人客觀特質					
女性	0	1	.50	N.A.	1073
年齡	1	5	2.95	1.40	1061
教育程度	1	5	3.10	1.41	1070
職業別					
農林漁牧	0	1	.07	N.A.	1048
藍領	0	1	.32	N.A.	1048
家庭每月總所得	1	10	5.17	3.19	877
個人主觀認知					
社會地位	0	10	4.58	1.82	964
平等價值觀	0	1	.31	N.A.	1021
政黨認同					
泛綠認同	0	1	.26	N.A.	1046
中立選民	0	1	.43	N.A.	1046
貧富差距認知	1	4	3.50	.74	989
公民意識	4	16	12.60	2.22	890
政經環境因素					
縣市家庭可支配所得	615006	1246310	N.A.	N.A.	1064
縣市家庭貧富差距	36610	245330	N.A.	N.A.	1064
縣市失業率	.046	.052	N.A.	N.A.	1064
縣市長黨籍	0	1	.32	N.A.	1064
民進黨執政深度	0	.86	N.A.	N.A.	1064

說明：1. 各變數樣本數不一的原因是因為排除遺漏值所致。

2. N.A. 表示該數值無意義，因此本文不予顯示。

64,000 元之間。¹⁸

個人主觀認知方面，在社會地位部份，如果社會地位由低至高為 0 至 10 分，樣本平均主觀認為的社會地位為 4.58 分，表示多數樣本認為自己的社會

18 樣本的平均家庭每月總所得落在 54,001 元至 64,000 元之間。乍看之下，可能會以為「公民意識與社會正義」調查的受訪者多為中產階級的民眾。但是實際上，如果進一步分析各家庭每月總所得的次數分配，即可發現家庭每月總所得為 24000 元以下、24001 元至 35000 元以及 131001 元以上的受訪者也相當多。換言之，「公民意識與社會正義」調查結果涵蓋了各種所得階層的民眾。

地位是中間偏下的階層。¹⁹ 在平等觀部份，有 31% 的民眾認為政府在制訂政策的時候，應該給弱勢的人多一點的表達機會。在政黨認同部份，有 26% 的民眾認同泛綠政黨；有 43% 的民眾為中立選民，其餘 31% 的民眾則認同泛藍政黨。在公民意識部份，公民意識分數由低至高為 4 至 16 分，樣本公民意識的平均分數為 12.60 分，表示樣本的公民意識為中間偏高。在貧富差距認知部份，樣本的平均數為 3.5，表示民眾普遍認為貧富差距相當嚴重。

政經環境因素方面，縣市平均家庭可支配所得最低的三個縣市分別為雲林縣（615,006 元）、嘉義縣（629,952 元）、花蓮縣（655,696 元），而最高的三個縣市則是臺北市（1,246,310 元）、新竹市（1,133,833 元）、新竹縣（1,011,033 元）。各縣市家庭的貧富差距較小的三個縣市分別為臺北縣（家庭可支配所得標準差為 36,610 元）、嘉義縣（36,919 元）、臺北市（43,857 元），而貧富差距較大的三個縣市則是新竹縣（245,330 元）、澎湖縣（235,036 元）、臺東縣（133,244 元）。失業率最低的縣市為澎湖縣（4.6%），次低的縣市為宜蘭縣（4.8%）、嘉義市（4.8%）、臺南市（4.8%）與屏東縣（4.8%），最高的縣市則是南投縣（5.2%）與花蓮縣（5.2%）。縣市長黨籍部份，有 32% 的樣本是居住於泛綠政黨執政的縣市，包括宜蘭縣、雲林縣、嘉義縣、臺南縣、高雄縣、屏東縣、臺南市與高雄市等等。至於，民進黨執政深度最低的縣市有苗栗縣（0）、臺東縣（0）與花蓮縣（0），而民進黨執政深度較高的縣市則是宜蘭縣（0.86）、高雄縣（0.86）與嘉義市（0.83）。

二、迴歸模型分析

表 2 為兩種重分配政策偏好模型的統計分析結果，這兩種模型的差異在於：模型(一)放入個人客觀特質、個人主觀認知與政經環境因素等三類自變數；模型(二)則是放入個人客觀特質、個人主觀認知、政經環境因素等三類的自變數之外，再加入「女性×家庭每月總所得」、「女性×平等價值觀」以及「公

19 這與中研院的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發現頗為類似，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發現在 1992 年至 2007 年間，國人認同自己是中層階級的人，從 40% 下降至 32%，自以為是中下和勞工階級的，更從 50% 上升至 64%（林倖妃，2011: 66）。

表 2：重分配政策偏好模型

變數名稱	重分配政策偏好(-)		重分配政策偏好(=)	
	迴歸係數	(t 值)	迴歸係數	(t 值)
常數	.393	(.20)	.170	(.93)
個人客觀特質				
女性	.084	(1.12)	.354**	(2.11)
年齡	.040	(1.14)	.041	(1.18)
教育程度	.070**	(1.78)	.075**	(1.88)
職業別				
農林漁牧	-.118	(-.73)	-.10	(-.56)
藍領	-.005	(-.06)	.003	(.04)
家庭每月總所得	-.027**	(-2.07)	-.004	(-.25)
個人主觀認知				
社會地位	.017	(.65)	.018	(.68)
平等價值觀	.287***	(3.87)	.289***	(2.74)
政黨認同				
泛綠認同	.204**	(2.14)	.168**	(1.67)
中立選民	.085	(.94)	.090	(.99)
貧富差距認知	.087**	(1.66)	.086*	(1.63)
公民意識	.073***	(3.87)	.059***	(2.90)
政經環境因素				
縣市家庭可支配所得(百萬元)	-0.193	(-.70)	-0.184	(-.66)
縣市家庭貧富差距(百萬元)	0.579	(.61)	0.559	(.59)
縣市失業率(%)	14.828	(.38)	19.321	(.50)
縣市長黨籍	-.038	(-.35)	-.038	(-.35)
民進黨執政深度	.147	(.83)	.160	(.90)
女性×家庭每月總所得			-.044**	(-1.88)
女性×平等價值觀			.002	(.01)
公民意識×泛綠認同			.052#	(1.23)
觀察值(N)	646		646	
調整後的 R ²	.059		.063	

說明：1. 兩個模型的自變數 VIF 皆小於 10，並未呈現出多重共線性。

2. 兩個模型皆採用 robust standard error，以矯正變異數不齊一的問題。

3. #表示接近 $P < .1$ ；*表示 $p < .1$ ；**表示 $p < .05$ ；***表示 $p < .01$ ，採單尾檢定。

民意識×泛綠認同」等三個交乘變數。²⁰兩種模型的統計分析結果如下：

第一，由重分配政策偏好模型(一)的統計結果發現，民眾的教育程度越高、家庭每月總所得越低、越具有平等價值觀、政黨認同傾向於泛綠、認為貧富差距嚴重、公民意識越高者會傾向偏好重分配政策。而其餘的變數並未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

第二，由重分配政策偏好模型(二)的分析結果發現，模型(一)達到統計顯著水準的自變數當中，除了家庭每月總所得這個變數之外，其他在模型(二)也同樣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並且迴歸係數的方向也相同，這些自變數包括民眾的教育程度越高、越具有平等價值觀、政黨認同傾向於泛綠、認為貧富差距嚴重、公民意識越高者會傾向偏好重分配政策。而在模型(一)當中未達到統計顯著水準的「性別」(女性)，在模型(二)則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正向)，而且有趣的是，「女性×家庭每月總所得」的交乘變數同時也達到負向顯著性($p < .05$, $t = -1.88$)。從女性這個單一變數的迴歸係數以及「女性×家庭每月總所得」交乘變數的迴歸係數來看，它們所代表的意義在於：當家庭每月總所得的水準低的時候，女性確實會比男性更偏好重分配政策；不過當家庭每月總所得很高的時候，女性未必會比男性有較高的重分配政策偏好。²¹

20 模型二的「公民意識×泛綠認同」經過 centering 的程序。因為如果模型二同時放入「泛綠認同」與「公民意識×泛綠認同」兩個變數時，將會產生多重共線性的問題。針對這個問題，Cronbach (1987) 建議可以藉由 centering 的過程來矯正模型放入交乘變數後，產生的多重共線性問題。因此，我們將原本公民意識變數進行 centering (各觀察值減平均數)，然後再與泛綠認同進行交乘。經過 centering 後，模型二即可通過多重共線性的檢定。

21 本研究的每月家庭總所得變項的分數區間介於 1 至 10 分(分數愈高表示家庭總所得愈高)，女性這項變數的編碼為 1 是女性，0 是男性。由於女性變數的迴歸係數為 .354，而「女性×家庭每月總所得」交乘變數的迴歸係數為 -0.044 。所以在控制其他自變數的情況下，當民眾的性別為女性(編碼為 1)，並且她的家庭每月總所得為 1 分時，則她的重分配政策偏好的係數效果為 $0.354(1) + [(-0.044)(1) \times 1] = 0.31$ ，表示女性比男性有較高的重分配政策偏好。不過，當性別為女性而她的家庭每月總所得為 10 分時，她的重分配政策偏好的係數效果為 $0.354(1) + [(-0.044)(1) \times 10] = -0.086$ ，這表示女性未必會比男性有較高的重分配政策偏好。至於家庭每月總所得高到什麼程度時，女性就未必會比男性更偏好重分配政策了呢(係數效果由正轉為負)? 這個臨界值大約是家庭每月總所得介於 8 分至 9 分之間，但是不到 9 分(在編碼上， $8 = 86,001$ 元~ $102,000$ 元)，也就是當家庭每月總所得高過 8 分再多一點時，女性就未必會比男性有較高的重分配政策偏好。

至於「女性×平等價值觀」的交乘變數並未顯著地影響她們對於重分配政策的偏好。比較這兩個交乘變數的統計分析結果，理性自利的觀點解釋臺灣女性偏好重分配政策的原因似乎比公平正義的觀點更為合適。至於「公民意識×泛綠認同」這一個交乘變數，雖然並未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但是已經非常接近（接近 $p < .1$ ， $t = 1.23$ ）。

第三，雖然我們在模型(一)與模型(二)當中發現許多個人客觀與主觀認知的變數對於重分配政策偏好的影響，但是五個縣市的政經環境變數並未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

伍、研究發現與討論

本文藉由 2010 年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的政治思想研究專題中心與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共同進行的「公民意識與社會正義」調查研究資料，分析我國民眾偏好重分配政策的因素。我們除了探討民眾的個人客觀特質、主觀認知之外，同時也特別關心他們居住縣市政經環境的差異是否也會影響他們的重分配政策偏好。經過實證分析之後，本研究有幾項重要的發現：

第一，有相當多的民眾（約 65%）支持政府推動重分配政策。第二，教育程度越高、家庭每月總所得越低、越具有平等價值觀、泛綠的政黨認同、認為貧富差距嚴重、公民意識越高等特質的民眾都會更為偏好重分配政策。這些達到統計顯著水準的變數在迴歸係數的影響方向與過去的研究發現大多相同（Bartels, 2008; Chang, 2010; Corneo, 2000; Corneo and Grüner, 2002; Hasenfeld and Refferty, 1989; Iverson and Soskice, 2001; Johnston et al., 2010; Lübker, 2007; Rainer and Siedler, 2008; Rehm, 2005; 何智翔、林翠芳, 2011）。其中，本文比較獨特的發現是：整體而言，家庭每月總所得以及平等價值觀兩個變數都顯著影響民眾的重分配政策偏好。換言之，臺灣民眾偏好重分配政策不僅僅是基於理性自利的考量，同時也蘊含著社會公平正義價值的具體實踐。因此，與其說理性自利與公平正義這兩種不同的觀點是競爭性理論，還不如說它們是以不同角度互補地解釋了臺灣民眾偏好重分配政策的理由。

第三，過去的研究分別以理性自利與公平正義兩種不同的觀點來解釋女性為何較偏好重分配政策。前者認為女性因為經濟弱勢所以偏好重分配政策；後者則認為女性因為較具有同理心與平等觀而偏好重分配政策。本研究的統計分析結果發現，當家庭總所得低的時候，女性確實較男性偏好重分配政策；不過當家庭總所得很高時，女性未必會比男性有較高的重分配政策偏好。至於「女性×平等價值觀」交乘變數則沒有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基於這些分析結果，相較於公平正義的觀點，理性自利的觀點比較適合用來解釋臺灣女性偏好重分配政策的理由。

第四，我們發現公民意識高的民眾會比較偏好重分配政策。然而，同樣具有高程度公民意識的泛綠政黨認同民眾與非泛綠政黨認同的民眾，彼此在重分配政策的偏好是否有所差異呢？統計分析顯示，民眾越有意願關注或參與公共事務並且傾向認同泛綠政黨時，他們會比較偏好重分配政策。

第五，儘管重分配政策偏好的分析結果大致上都與過去研究的發現相互呼應，然而，本文並未印證 Dion 與 Birchfield (2010) 以及 Rainer 與 Siedler (2008) 所發現的政經環境差異對於民眾重分配政策偏好的顯著影響。不過，如果檢視這五個政經環境因素的迴歸係數正負符號，除了縣市長黨籍變數之外，其他四個變數的係數方向皆與理論預期的方向相同。至於這些政經環境變數真的對於民眾的重分配政策偏好沒有影響嗎？其實我們也不敢斷言。理想上來說，分析單位是個人，當統計模型的自變數包含了個人特質與個人所處的政治經濟的環境因素時，多層次模型應該是最理想的估計模型。然而，「公民意識與社會正義」調查資料庫中，因為部份縣市的民眾樣本數過少，以致於限制了這種模型的運用。未來的調查如果可以讓各縣市的樣本數到達一定規模數量時，那麼運用多層次迴歸模型就能更精確地檢視民眾所處縣市的政經環境差異對於他們的重分配政策偏好的影響。

在以上影響民眾重分配政策偏好的各個因素當中，教育程度這個變數頗值得進一步討論，因為它多少反映了目前臺灣現實環境當中的問題，同時也傳達了政府必須儘速解決這項問題的警訊。本文發現教育程度越高的民眾比教育程度低的民眾更偏好重分配政策。對於這個現象的解釋，我們認為可能跟臺灣近年來大學以上學歷的人失業率較高有關。依據行政院主計處近五年

的失業率統計，2006年全國平均失業率為3.91%，大學以上的失業率為4.36%；2010年全國平均失業率增加至5.21%，大學以上的失業率更增加到5.62%，而國中以下的失業率則只有4.83%（行政院主計處，2011b）。換言之，雖然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平均月薪比較高，²²但是他們所面臨的潛在失業風險卻也比教育程度低的人來得高，既然如此，他們就可能更殷切期盼政府推動重分配政策，以保障他們未來可能發生的失業生活。²³

參考資料

A. 中文部分

中央選舉委員會

2011 〈選舉資料庫〉。2011年3月23日，取自 <http://210.69.23.140/cec/cechead.asp>
行政院主計處

2010a 〈九十八年家庭收支調查報告〉。2011年3月23日，取自 <http://www.dgbas.gov.tw/ct.asp?xItem=19882&CtNode=3241&mp=1>

2010b 〈九十九年人力運用調查〉。2011年5月5日，取自 <http://www.dgbas.gov.tw/public/Attachment/111315141071.pdf>

2011a 〈人力資源統計月報：99年12月〉。2011年3月23日，取自 <http://www.dgbas.gov.tw/ct.asp?xItem=28680&ctNode=3247>

2011b 〈失業率按教育程度分〉。2011年5月27日，取自 http://win.dgbas.gov.tw/dgbas04/bc4/manpower/w_103uemr_a.asp

何智翔、林翠芳

2011 〈我國人民對政府重分配政策偏好之探討〉，《當代財政》3: 61-74。

林佳龍

2000 〈台灣民主化與政黨體系的變遷：菁英與群眾的選舉連結〉，《台灣政治學刊》4: 3-55。

22 2010年，大學以上的平均每月薪資為42,550元，高於全國平均月薪的34,431元（行政院主計處，2010b）。

23 本文在接受匿名審查時，其中一位審查人也提出另外一種觀點：教育程度高的人會偏好重分配政策的原因也可能是因為他們較具有利他或者是更傾向自由派（Liberal）。作者其實也並不排除這種可能性的存在。我們認為未來應該需要進一步驗證高教育程度的人究竟是因為他們的「就業狀況不佳」，還是因為他們的「平等價值」（egalitarian values）而導致對於重分配政策的偏好。這個研究方向不僅有助於重分配政策偏好研究的持續累積，同時也可以藉此檢視臺灣高等教育的人才培育結果，所以將會是未來可以持續投入的重要研究議題。

林倖妃

2011 〈階級不流動的三大原因〉，《天下雜誌》472: 66-68。

林萬億

2005 〈1990年代以來臺灣社會福利發展的回顧與展望〉，《社區發展季刊》109: 12-35。

郭秋永

2009 〈公民意識：實證與規範之間的一個整合研究〉，見張福建（編），《公民與政治行動：實證與規範之間的對話》，頁41-94。台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陳正芬、官有垣

1997 〈政黨競爭、地方自主性與社會福利：以民進黨執政的台北市為例〉，《中國行政評論》7(1): 57-98。

黃德福、謝俊義、劉嘉薇

2010 《臺灣民眾政治信任與政策偏好之研究》。台北：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詹火生

2011 〈建國百年我國社會政策的過去、現在與未來〉，《社區發展季刊》133: 81-92。

維基百科網站

2011 〈歷屆各縣市市長〉。2011年4月28日，取自 <http://zh.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E9%A6%96%E9%A1%B5>

蔡佳泓、俞振華

2011 〈地方政府如何回應民意？以2006-2007年為例〉，《台灣政治學刊》15(1): 73-136。

B. 外文部分

Abowitz, Kathleen Knight and Jason Harnish

2006 “Contemporary Discourses of Citizenship,” *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76(4): 653-690.

Alesina, Alberto F. and Paola Giuliano

2009 “Preference for Redistribution,” *NBER Working Paper* No. 14825. Cambridge, MA: NBER. Retrieved January 19, 2011, from <http://ftp.iza.org/dp4056.pdf>

Bartels, Larry M.

2008 *Unequal Democracy: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New Gilded Ag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Chang, Wen-chun

2010 “Religion and Preferences for Redistributive Policies in an East Asian Country,” *Poverty & Public Policy* 2(4): 81-109.

Corneo, Giacomo

2000 “Inequality and the State: Comparing U.S. and German Preferences,” *CESifo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398. Munich: CESifo. Retrieved January 19, 2011, from http://papers.ssrn.com/paper.taf?abstract_id=260914

Corneo, Giacomo and Han Peter Grüner

2002 “Individual Preferences for Political Redistribution,”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83: 83-107.

Cronbach, Lee J.

1987 “Statistical Tests for Moderator Variables: Flaws in Analyses Recently Proposed,”

-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02(3): 414-417.
- Denhardt, Robert B. and Janet V. Denhardt
2009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 Action Orientation*, 6th ed. Belmont, CA: Thomson Wadsworth.
- Dion, Michelle L. and Vicki Birchfield
2010 "Economic Development, Income Inequality, and Preferences for Redistribut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54(2): 315-334.
- Freedman, Paul, Michael Franz, and Kenneth Goldstein
2004 "Campaign Advertising and Democratic Citizenship,"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8(4): 723-741.
- Hasenfeld, Yeheskel and Jane A. Refferty
1989 "The Determinants of Public Attitudes toward the Welfare State," *Social Forces* 67(4): 1027-1048.
- Hsieh, John Fun-sheng
2005 "Ethnicity, National Identity, and Domestic Politics in Taiwan," *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40: 13-28.
- Iverson, Torben and David Soskice
2001 "An Asset Theory of Social Policy Preference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5(4): 875-893.
- Johnston, Richard, Keith Banting, Will Kymlicka, and Stuart Soroka
2010 "National Identity and Support for the Welfare State,"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3(2): 349-377.
- Lübker, Malte
2007 "Inequality and the Demand for Redistribution: Are the Assumptions of the New Growth Theory Valid?" *Socio-Economic Review* 5(1): 117-148.
- Meier, Kenneth J.
2000 *Politics and the Bureaucracy: Policymaking in the Fourth Branch of Government*, 4th ed. Fort Worth, TX: Harcourt College Publishers.
- Meltzer, Allan H. and Scott F. Richard
1981 "Theory of the Size of Government,"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9(5): 914-927.
- Rainer, Hemut and Thomas Siedler
2008 "Subjective Income and Employment Expectations and Preferences for Redistribution," *Economics Letters* 99: 449-453.
- Rehm, Philipp
2005 "Citizen Support for the Welfare State: Determinants of Preferences for Income Redistribution," *WZB Markets and Political Economy Working Paper* No. SP II 2005-02. Berlin: Wissenschaftszentrum Berlin. Retrieved January 19, 2011, from <http://bibliothek.wzb.eu/pdf/2005/ii05-02.pdf>
- Ripley, Randall and Grace Franklin
1991 *Congress, Bureaucracy, and Public Policy*, 5th ed. Pacific Grove, CA: Brook-Cole.

Scheve, Kenneth and David Stasavage

2006 “Religious and Preferences for Social Insurance,” *Quarterly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 255-286.

2008 “Religion and Social Insurance: Evidence from the United State, 1970-2002,” pp. 149-185 in Ian Shapiro, Peter A. Swenson, and Daniela Donno (eds.), *Divide and Deal: The Politics of Distribution in Democracie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Suhrcke, Marc

2001 “Preference for Inequality: East vs. West,” *Innocenti Working Paper* No. 89. Florence: UNICEF Innocenti Research Centre. Retrieved January 19, 2011, from <http://repec.org/res2002/Suhrcke.pdf>

附錄 1：問卷各變數的操作化內容與編碼

依 變 數
<p>重分配政策需求：4題加總，尺度為0分至4分，分數越高表示越偏好重分配政策。</p> <p>C13 有人認為：「為了社會公平，政府應該縮小貧富差距」；也有人認為：「為了經濟發展，政府不用刻意縮小貧富差距」。請問您比較同意哪一種說法？ (政府應該縮小貧富差距=1、政府不用刻意縮小貧富差距=0)</p> <p>C15 就發展經濟與社會福利來看，當政府財源有限的情況下，您比較希望先發展經濟，還是先發展社會福利？ (發展經濟=0、社會福利=1)</p> <p>C26 有人認為：「政府應該給予社會上較弱勢的人比較多的照顧」；但也有人認為：「政府的政策應該對每個人都一樣，不應該給予任何人特別的照顧」，請問您比較同意哪一種說法？ (應該給予社會上較弱勢的人比較多的照顧=1、不應該給予任何人特別的照顧=0)</p> <p>C27 有人認為：「政府應該要求社會上較有能力的人多負擔一些」；但也有人認為：「政府的政策應該對每個人都一樣，不需要對有能力的人有更多的要求」，請問您比較同意哪一種說法？ (應該要求社會上較有能力的人多負擔一些=1、不需要對有能力的人有更多的要求=0)</p>
自 變 數
<p>女性： (女=1)、(男=0)</p>
<p>年齡： (20至29歲=1)、(30至39歲=2)、(40至49歲=3)、(50至59歲=4)、(60歲及以上=5)</p>
<p>教育程度： (小學及以下=1)、(國、初中=2)、(高中、職=3)、(專科=4)、(大學及以上=5)</p>
<p>職業別： 共3個類別，以白領為基準，建立農林漁牧與藍領兩個虛擬變數。</p>

<p>家庭每月總收入：</p> <p>(24000 元以下=1)、(24001 元~35000 元=2)、(35001 元~45000 元=3)、(45001 元~54000 元=4)、(54001 元~64000 元=5)、(64001 元~74000 元=6)、(74001 元~86000 元=7)、(86001 元~102000 元=8)、(102001 元~131000 元=9)、(131000 元以上=10)</p>
<p>社會地位：0 分至 10 分，分數越高表示自認為社會地位越高。</p> <p>C14 在社會上，有些人社會地位比較低，有些人社會地位比較高，如果用 0 代表社會地位最低，用 10 代表社會地位最高，請問在 0 到 10 之間，您覺得您的社會地位差不多在哪裡？</p>
<p>平等價值觀：</p> <p>C24 有人認為：「政府在制定政策時，應該給社會上較弱勢的人更多表達意見的機會」；但也有人認為：「應該讓每個人表達意見的機會都相同」，請問您比較同意哪一種說法？</p> <p>(應該給社會上較弱勢的人更多表達意見的機會=1、應該讓每個人表達意見的機會都相同=0)</p>
<p>政黨認同：</p> <p>共 3 個類別，以泛藍認同為基準，建立泛綠認同與中立選民兩個虛擬變數。</p>
<p>貧富差距：尺度為 1 分至 4 分，分數越高表示越覺得貧富差距嚴重。</p> <p>C12 請問您認為在我們社會上比較沒有錢的人和比較有錢的人之間的矛盾嚴不嚴重？</p> <p>(非常不嚴重=1、不太嚴重=2、有點嚴重=3、非常嚴重=4)</p>
<p>公民意識：4 題加總，尺度為 1 分至 16 分，分數越高表示公民意識越高。</p> <p>C8 (有人說：「政治的事情交給政治人物處理就好」，請問您同不同意這種說法？</p> <p>(非常不同意=4、不太同意=3、有點同意=2、非常同意=1)</p> <p>C9 有人說：「當政治人物的意見與我們不一樣的時候，我們應該公開表達反對的意見」，請問您同不同意這種說法？</p> <p>(非常不同意=1、不太同意=2、有點同意=3、非常同意=4)</p> <p>C10 有人說：「只要做好自己的事，不要過問公眾事務」，請問您同不同意這種說法？</p> <p>(非常不同意=4、不太同意=3、有點同意=2、非常同意=1)</p> <p>C11 有人說：「對於公眾的事務，我們都應該主動發表自己的意見」，請問您同不同意這種說法？</p> <p>(非常不同意=1、不太同意=2、有點同意=3、非常同意=4)</p>

The Determinants of People's Preferences on Redistributive Policies in Taiwan

Wen-hsueh Chen

Doctoral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Policy,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Ching-jyuhn Luor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Policy,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ABSTRACT

Based on survey data on citizenship and social justic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factors affecting people's preferences on redistributive policies in Taiwan. Specifically, we ask whether and how one's socio-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personal beliefs and attitudes, and for environmental factors (economic and political) around them influence their needs on redistributive intervention from government.

First of all, the findings show that people who are well-educated, with lower family income, or females with lower family income tend to favor redistributive policies. Furthermore, those who have strong egalitarian values or perceive economic inequality as serious are likely to prefer government's redistributive intervention. Finally, people who identify with the pan-green party, or who so identify and also have a higher sense of citizenship, are also inclined to support redistributive policies. While the variables of individual level are better predictors, we do not systematically find significant 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factors on people's distributive preferences.

These findings may have some implications on assessing current people's preferences on redistributive policies and the critical role that government should play in the near future in Taiwan.

Key Words: citizenship, economic inequality, party identification, policy preference, redistributive policy

